



七日談



自由談

李丹崖

故鄉譙望樓每一層皆有四角，飛簷翹腳下各掛一隻銅鈴，有風吹來，銅片做成的鐃被吹動，敲擊着鈴聲，叮叮噹噹，格外悅耳。銅，給人的印象是極其沉重的東西，做薄了，風大了，也照樣能被搖曳生姿，且有聲律。

古代有一種相風的氣象工具，也是用銅做成的。一根竿子，上面站立着一隻銅做的鳳鳥，鳥頭小，鳥翅展，鳥尾闊，有風吹來，自然擺動，鳥首指的方向即風的方向。這種器具喚作「相風銅鳥」，也稱「相風銅鳥」，有的也寫成「相鳳銅鳥」，鳳是吉祥的鳥雀，善於馭風而行，故用牠來評測風向。在山西渾源縣的圓覺寺，有一座金代的磚塔，磚塔頂端就有一隻相風銅鳥，屹立塔頂八百年，兩翼展開，聽風吟，觀風雨，一個崗位堅守八百餘年，讓人一望生敬畏，驚嘆於古之匠人的精工巧作。

想起蒙城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盧家笙，「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笙作為一種中國古典樂器，做工尤為考究，木做的笙斗，竹子做的笙管，簧片是笙的嗓門，多用敲廢了的銅鐃做成，銅鐃廢了，不能再被敲擊，磨薄了，嵌入笙管中，繃口一吐的氣流，牽動簧片的震動，形成美妙的韻律，這堪稱人口中鼓出的小型風暴，美妙和奇特。

銅為吉金，從古至今，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總少不了它的影子。在朋友的茶室看到一隻銅建水，就是最簡單的水盂狀，粗略一看，也有百餘年，卻沒有銅綠，相反，還生了包漿。這隻銅建水，是他的外祖父留給他的，外祖父是個特別愛喝茶的人，生在書香門第，當然，外祖父也很疼他，自小把他拉扯大。朋友說，風光朗朗的秋日，他喜歡在自家樓頂上吃一盞茶，靜下心來，清空銅建水，風吹過銅建水的鳴鳴聲，帶着金屬質感，特別悅耳，那感覺像一位老者的耳語。

熱鬧中的獨處

——探訪香港中央圖書館



HK人與事

陸小鹿

少時讀朱自清《荷塘月色》，有一句記得極牢：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群居，也愛獨處。置身香港，又想起這句話來。香港是熱鬧的。市聲尤其大，比許多城市都要高出幾分。叮叮車、行人的對話、商舖門口的推銷，加上馬路本就窄，走在其中，只覺得這座城市能量很高，生機勃勃。我喜歡這熱鬧的歡騰，它沖淡了獨處的孤單。熱鬧中的獨處，自由而有安全感。假若抽離了熱鬧，反倒難免空落。然而，當我步入銅鑼灣高士威道六十六號，瞬間切入另一個畫面。這裏是香港最大的公共圖書館——香港中央圖書館。拾階而上，每級台階上刻着一句名言，從先秦諸子到近現代文人都有。它們不是大眾層面人人皆知的名言，不少要深耕閱讀的人才會知曉，比如《韓非子》裏的這句：「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

紅氣球又飄來了——寫在二〇二六武漢雙年展開展之後

吳洪亮

交會 自然互放光亮

這裏借用了徐志摩的詩，和武漢的特點，自然引出了本次雙年展的主題「偶×遇／Walk&Talk」。雖不是宏大敘事，但因為「大武漢」的厚度，自然鏈接着古今、對接着國際，鋪好了展覽的敘事脈絡，像個劇本。從漢口煙火到琴台文脈（武漢美術館分為漢口館與琴台館），歷史的沉澱、當下的鮮活、未來的想像，都被步履串聯。漫步、觀看、閒談、思考，每一次不期而遇，都很新鮮。特別想說，那個「偶」和「遇」中間的「×」號，是我執意放入的。因為，偶遇不是加法，是乘法，每一次相遇所能生發的，常常在預設之外。

一個大型的城市雙年展，團隊與結構很重要。這次，中國美協主席范迪安先生任我們總顧問，我作為總策展人，武漢美術館館長陳勇勁任展覽總監。主體展覽分八個板塊：「而然必然」由我策劃，「草稿複稿」是趙子懿，「未知降落」是邵舒，「迴旋轉變」來自德國的約爾格·海澤，「臨時渡口」來自湖北美術學院的唐驍，「局部有網」由UFO媒體實驗室擔綱，「家鄉來信」由法國策展人費保羅呈現，「江流過身」由劉希言主持，另設「有未」青年策展人項目以及兩個特別單元：漢雙×騰挪、流動的藝域。各位策展人，國別有不同，代際有差異，如支流之匯長江，本毋須「達成一致」——我們希望的正是差異並存，如武漢，容得下南腔北調。

「而然必然」板塊，敘事即從江城的「戲碼頭」開始。漢劇作為京劇重要的源頭之一，在這裏流轉、生長、傳向四方。回望歷史，京

劇宗師梅蘭芳與漢劇大師陳伯華當年在漢口惺惺相惜、亦師亦友的交往，正是這座碼頭城市開放包容、藝脈互通的生動見證。本次漢雙不僅展出了兩人出演《宇宙鋒》《貴妃醉酒》的服裝與文獻，還專門請藝術家王珂歷經數月創作了一幅油畫《京漢芳華》，呈現兩位名家相互切磋的情景。順着長長的棧橋觀眾可以走入賴聲川的《暗戀桃花源》，劇場中的磕磕碰碰，正是一次歷史的穿越。甚至走到歐洲，攝影師西瑪鏡頭中的畢加索及彼時的巴黎畫派。來自中國美術館的重要藏品畢加索一九六七年的水墨作品《人物形象》成為本次展覽的明星作品。而晚年畢加索的水墨創作與中國還有着不解之緣。一九五六年，張仃、王雪濤在法國拜訪畢加索，贈以《齊白石畫集》，勾起了畢加索對水墨的興趣。畢加索則在畫冊上畫下一隻象徵和平的鴿子作為回禮。而鴿子作為象徵物成為展覽的另一條線索，呼應着藝術家潘義奎的油畫《白石老人》，畫中描繪的正是齊白石伏案繪製和平鴿的情景。在這個板塊，以作品、文獻作為敘事還有很多，我們希望帶觀眾在行走中進入一個可共情的藝術場域。

比敘事走得更遠的，是展覽在武漢三鎮的溢出。「溢出」，非藝術簡單地「走出美術館」，是從「白盒子」向日常生活的自然漫延。而「漢雙×騰挪」單元，成為武漢美術館漢口館周邊的一道新風景。此次騰挪小組進駐保華街，將美術館周邊五間閒置商鋪化為二十四小時不熄的「藝術櫥窗」。策展人楊逸凡等率團隊在館舍三公里之內，採集居民棄置的舊桌椅，施以彩漆，創作出互動休憩空間《歇一哈》——每一把椅子上，都坐着一段街坊的往

一座城何以成為「文化堡壘」 父母的故事，必須放回桂林文化城的整體圖景裏才看得清。

一九三八年武漢、廣州相繼淪陷後，湘桂鐵路通車，桂林成了連接西南與華南、華中的樞紐；桂系相對開明的文化政策、較寬鬆的政治空氣、便利的水陸交通與周邊相對便宜的紙張，把這座邊陲小城意外托舉為全國大後方的文化中心之一。據史料記載，抗戰期間先後來到桂林的文化人達千名以上，有一個時期文化人數量之多，超過全國任何一個城市。皖南事變之前，到桂林的文化界人士有一千多人，進步文化團體多達四十多個。

桂林的出版業空前繁榮。抗戰時期桂林有大小出版社、書店二百二十四家，有大小印刷廠一百零九家，共出版圖書二千多種，出版期刊近三百種，出版報紙十五種。桂西路幾乎全是書店，有「書店街」之稱。出版家趙家璧回憶稱「抗戰時期國統區的書刊，有百分之八十是在桂林出版的」。

更關鍵的是共產黨統戰與組織線索的嵌入：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統籌《救亡日報》復刊、國際新聞社、新知書店、生活教育社等陣地，把左中右都能讀的報紙、能賣的課本、能演的戲，穩穩安在國統區腹地裏。一九三九年《救亡日報》復刊時，李克農從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倉庫中撥出白報紙，夏衍與李克農通過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籌得一千五百元港幣，確保了報紙的按時復刊和發行。

於是桂林的奇景出現了——敵機在頭上扔彈，岩洞裏陶行知在講民眾課，七星岩壁刻着「敵人在轟炸，我們在上課」；太平路報社的機器搬進灘江邊的岩洞，借燭光繼續印刷；桂西路的「書店街」夜裏還亮着燈，副刊、木刻、漫畫、兒童文學擠在同一塊版面上爭口氣。夏衍在

走進館內，很神奇地，市聲一秒被過濾掉了，像被誰按了消音器。館內隨處可見「靜」字提醒牌。我從一樓走到八樓，每一層都靜悄悄的。某層設有兒童活動中心，遇到一群小朋友，本該是咋咋呼呼的年紀，大家竟也輕聲細語，我便也不敢大聲呼吸，暗自感慨，安靜是可以互相感染的。

走着走着，覺得這安靜是有層次的。既有秩序井然的靜，也有各得其樂的靜。七樓「視聽站」可辦臨時試聽證，我選了場「陪伴空巢老人」的粵語講座，在電腦上聽。聽着聽着，發現自己竟能聽懂一些粵語，便生出回家要學粵語的念頭。語言很重要，多會一種，生活就多方便一些。假設我會粵語，這場講座能吸收的想必更多。

八樓陳列着張愛玲《小團圓》的手稿複印件，還讓我「種草」了一本書——《香港文學散步》。書裏引言提到，「文

學散步」這個概念早在日本普及生根，即依據文學作品的文字軌跡，以步履為筆，用腳步探訪那些被描繪過的文學地圖。我想，我來探訪香港中央圖書館，這也是我的文學散步。

說到書，館裏的書都感覺是乾乾淨淨被人善待的，連普通雜誌也一本本套着保護夾。館內少見打卡拍照的遊人，大家安靜地讀書、用電腦工作。我還看到一位長者，帶着顏料盒，在座位上畫畫。報刊瀏覽區有內地二十多種報紙，也有香港及國外一些重要報刊，規定一次只能取閱一種。我翻閱了當天的《大公報》，作為《大公報》的作者之一，心情自然有些激動。

和內地圖書館一樣，香港中央圖書館也常舉辦文學講座。看到一張近期海報，有「陳蝶衣與海派時代曲」、「豐子愷在香港」、「舞台上的張愛玲」、「劉以鬯《對倒》的劇場再生」，全是我感興趣的

事。展覽是「會生長」的。依託藝術家駐留創作，展品與內容持續更新，輔以藝術快閃、現場互動演出，在跨過秋冬春夏的展期中，常看常新。

開展以來，更讓我高興的是觀眾的反饋。社交平台上的熱度已超預期。不同年齡段的觀眾的自發二創、打卡、長評絡繹不絕。施月八是位漢口出生三鎮長大的朋友。他闊別武漢十四年專程回漢看「漢雙」，一直看到當天閉館。他寫道：二〇二六武漢雙年展的琴台館、漢口館，不是「看懂了才值」的展而是「你肯走進來、肯停一下，它就開始跟你說話」的展的確，好的展覽不是單向的灌輸，而是雙向的喚醒與同頻共振——觀眾不只是觀眾，是推動者與共創者。

「漢雙」接下來還有七個月的展期，這將意味着什麼？聖誕的燈火、新年的鐘聲、春節的廟會、清明的櫻花、勞動節的火熱，與那隻紅氣球一起等您來。因為「武漢的好，是慢慢走出來、品出來的」。



▲西班牙畫家巴勃羅·畢加索水墨畫作品《人物形象》（前）在武漢美術館（琴台館）展出。 中新社

烽火伉儷與文化堡壘：我的父母與桂林文化城（下）

更是一種精神坐標。

父母在那裏的青春，證明了三件事。其一，文化不是炮火的陪襯，而是抵禦外侮的堡壘——當城市淪陷、交通截斷、教科書焚毀，一本《新兒童》、一張《救亡日報》就是不退的陣地。其二，知識分子的擔當，不在於姿態大，而在於肯把名字埋進版權頁、把稿費換成紙、把命懸在岩洞裏的燭火旁。其三，抗戰文藝的生命力，來自「左中右都要看」的胸襟——父親參與的《救亡日報》以「超黨派」面目辦報，連日本進步文人鹿地互、池田幸子等也常有文章在報紙上發表，報紙日發行量由最初三千份擴大到一萬餘份；母親編的《新兒童》團結南北兒童文學作者，證明統一戰線不是口號，是每天怎麼選稿、怎麼留白、怎麼讓孩子讀得懂又不矮化戰爭。

周錫鳴晚年回憶桂林，以「繁花競秀，盛極一時」概括那座文化城。母親活到逾九旬，一輩子被人叫「雲姊姊」，從香港跑到桂林、從桂林跑回廣州、再回香港，兜兜轉轉，守的仍是那本小雜誌裏的一線童心。

他們那代人替我們試過一遍：當國家往下墜的時候，筆是可以朝上的。

餘論 我寫這篇文章，不是為了把父母從「普通一兵」裏拎出來。恰恰相反——正因為他們普通，才更像桂林文化城的真相。

灘江的水聲替他們排過字，岩洞的石壁替他們壓過稿紙，桂西路的燈火替他們校過樣。他們沒留下巨著，只留下：一首還在被人哼的救亡歌、一本孩子攢着看的《新兒童》、一疊太平路報社的舊校樣、一句往後人耳朵裏遞的話——

文化若真活過，它就不在檔案館裏，它在少年第一次讀懂「國家」二字的那一刻，在轟炸間隙一個母親趴在膝上畫封面的那一筆。

這史詩，將永遠鐫刻在灘江的波光裏，也鐫刻在後輩的記憶中。



▲香港中央圖書館。 資料圖片

話題。可惜時間不合，只能遺憾錯過。走出圖書館，馬路上的市聲重新湧上來。叮叮車、人語，又像潮水一樣把人推回熱鬧的都市。我想，熱鬧並不排斥獨處，獨處也不必遠離人間。真正好的獨處，是在喧囂之中，仍能聽見心靈的聲響，感受自己的呼吸。